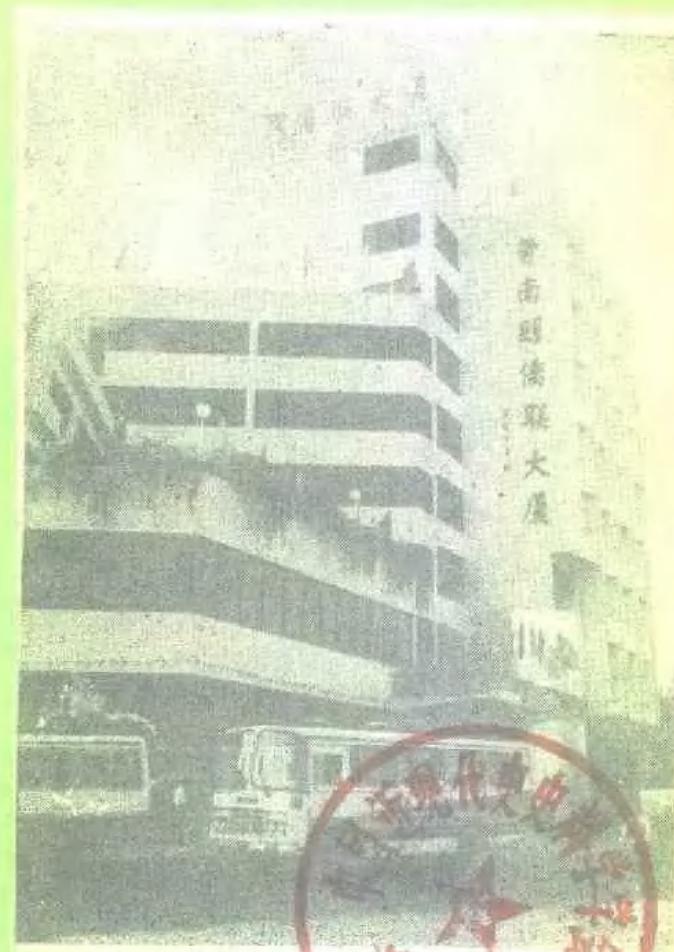


1918



史文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鹤南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郁 南 文 史

第十四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郁南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九四年八月

封面题字: 黄 森

封面摄影: 曾志宏

封面设计: 古春月

郁南文史 总第14期 1994年6月出版

《郁南文史》编辑部

责任编辑: 叶旭明

编 辑: 叶景清

校 对: 史 科

地址: 广东省郁南县

都城镇中山路46号

郁南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 张富文

副主任: 叶旭明

委员: 梁月英 曾展文

彭洪基 廖灼才

邮编: 527100 电话: 592278

91粤印准字第78号

郁南县人民印刷厂承印

目 录

编者 李光

峥嵘岁月

海外联谊

经济史话

文教风采

人物春秋

象山风云

李镇靖革命回忆录	(1)
建国后我县侨务工作回顾	陈佩珍 (49)
兴学育才，造福桑梓	谢 艳 (55)
漫话大湾商业	孔宪梓 陈 伟 杨雪媚 (68)
郁南林区动植物资源考	林 志 (72)
漫话宝珠荔枝	莫权嘲 (76)
南方大学校友在郁南	梁润林 (78)
郁南报业春秋	史 科 农 谷 (84)
郁南民间文艺概述	郁 寄 佳 梅 (88)
叶渭东生平述略	叶 钧 (111)
落籍郁南的第一位朝鲜人	李云峰医师
简记解放战争时期都城地区支前工作	陆无涯 叶景清 (122)
解放战争时期大方革命斗争简史	叶景清 谢天月 陈旺才 (124)
庚申西军退至平台片断	聂时雄 卢伟清 (134)
都城地下交通站	周树桃 (137)

烈士英魂

- 李保纯烈士简史 李炎芝 龙宝贤(139)
陈均权烈士事略 陈锐鸣(147)
郁南工人运动史略 陈良佳 金子康(155)
郁南民社党活动始末 谢绍权 陈良佳(171)

社团今昔

金菊拾瓣

- 县太爷趣闻(四则) 古音月 卢阳新(176)
连滩天然泉杂记 叶旭明(180)
毙虎实录 塘润林(184)
塘尾豆芽与象山泉水 崔风(186)
郁南位于西江中游的考证 魏华荣(187)

飞凤韵声

九老诗选

- 诗二首 叶钧森(189)
七绝 陈图南(190)
石门探胜 石河(190)
河堤公园 叶之华(190)
天沙净 欧培炎(191)
鸟瞰郁南药厂 谭知先(191)
江滨晚望 丘鲁九(192)
咏西江 崔沃钊(192)
重阳都城登高即景 张邦林(192)

读者·作者·编者 (193)

李镇靖革命回忆录

编者按：

为了总结革命前辈的斗争经验，学习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用历史知识启迪今人，教育后代，现把古成新同志多次整理并经其本人反复改写后的《李镇靖革命回忆录》一文在本刊登载，奉献给读者。同时对李镇靖同志不辞年迈支持办好本刊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

我是广东省郁南县桂圩镇人，1920年出生，父亲李精益，母亲袁淑英，1933年在郁南第一中学毕业。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高潮年代。大革命由广东出发，以第四军独立团叶挺将军为先导，取得北伐巨大胜利，由武汉长驱直下，建都南京。然而不久即展开内战。蒋介石利用北伐部队，与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各省军阀混战多年。我在中学的时代，充满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正如当时郁南一中校歌所说：“天马纵横锦水滨，笔峰高耸屹嶙峋。山明水媚钟灵秀，代有名人气象新。斯校兴起融融乐，莘莘学子受陶薰。发扬文化光斯土，幸勿辜负此青春。”……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反日运动的影响下，向进攻上海的日本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消息传来，使三罗（罗定、云浮、郁南）的人民斗

志奋发，我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鼓舞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3年，我中学毕业后，考进了广州黄埔军校航海系。入校后先被送去燕塘广东军官学校海（军）空（军）中队，作入伍训练。受步兵基本教练，熟悉步兵武器，及班、排、营的基本作战学习。翌年春结束后，回广东粤海军舰实习，又到当时中国最大的军舰海沂巡洋舰（8000多吨）受锻炼。不久海沂、海深两战舰的北方水兵，为薪金问题造反，起初冲出黄埔，炮轰虎门，驶出海洋，到达香港附近。因南京政府陈策的南京舰队所阻，于是避进香港。我们这些黄埔军校第二十二期海军学生，被遣送回广州，返黄埔海军学校读书。该海军学校是清朝起创办的，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她是以英国海军学校为样板，造就中国海军青年军官的。

这些海军学校十九期同学中，有陈守仁（即陈山），黄景文、杨昭崇（杨子英）等人参加了革命组织。领导者为广州培正中学高申语文教师陈黄光（浙江平阳人）。他在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上海中共特科成员，1931年以后担任广州、香港方面情报工作。他在广州培正中学教书时，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陈黄光同志于1934年11月在广州被捕，1935年被广东军阀陈济棠下令枪决，时年26岁。但他留下的事业后继有人。

陈守仁（即陈山）生前的自传（原稿已上送领导），已由广东有关部门摘抄了。陈山说：“自从陈黄光同志牺牲以来，我们上面就没有草头，我们小组躲过了这场风浪以后，知道我们这个秘密小组没有暴露，我们就坚持潜伏下去。如果有人怀疑，大家就以‘读书会’为名，继续活动。”我在校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在此前后，凡是有人从上海到广州，或是从香

港经广州去上海，都是以陈山或李见心等年龄较大的一些朋友去接送。一般社会活动，如参加中山大学“踏绿社”、推广界语及集会、游行等项活动都由我们年轻一些同学换了便衣去，但是这些活动大家都保守秘密，并采用单线联系。

1937年，陈山去江苏、镇江，与中共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中共南京办事处答应与中共西安办事处联系，要求他们同意我们去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我们接到陈山来信后，按照他来信地址，秘密在广州集中。第一批出发的有杨昭崇、梁锡琼和我等人员。我们迅即去南京，循着陇海铁路转到西安；乘坐由中共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和从北平南下的一些朋友共赴延安，参加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陈山动身较迟，进入了陕北公学，后转鲁迅艺术学院。我们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大家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参加抗日战争，为夺取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我和杨昭崇（杨子英）、梁锡琼（梁毅）都加入了抗大第三期学习，开始在抗大九队，后来又编入抗大八队。在学习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化名为李守诚、李成。1933年初，抗大教育长为罗瑞卿（后升为副校长），训练部长为刘亚楼（后升为教育长），政治部主任为莫文骅、胡耀邦。第三大队长为刘忠。刘亚楼负责上政治工作课；沙可夫负责上《统一战线》课，而上《游击战争》是一位老红军（名字忘记了）。毛泽东同志常常到操场看我们上操，也常来校作报告，讲《军事辩证法》及《当前抗战形势》等课程。

抗大三期在1938年夏举行毕业典礼，毛主席亲自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毕业后不久便分配工作，但有的同志转到第四期学习。我们第三期一批同学被分到武汉。中共武汉长江

局秘书长黄文杰同志对我说：“你（李守诚）的介绍信及档案已转来，有关问题已解决。但延安对广东的情况用较长时间才能弄清楚。广东现在迫切要干部，你还是回广东工作吧。”离开之前，还见一下中共长江局主要负责同志。不久他们送来自票和旅费给我们南下。

1938年7月，延安抗大三期毕业生郭晖（郭大同）以及梁毅（梁锡琼）和我一批人和陕北学回来的陈丽洲以及另一些人是在汉口集中从铁路回广州的。回来后我们虽不同地方居住，但常常见面，大家都说要搞抗日救国工作。陈丽洲回广州市警察局筹办劳工训练班，并从中抽调了一批骨干组织一个劳工干部训练队。我们得知这一个情况后，经中共广东省委同意，郭大同、招麦汉、陈哲平（林枫）、麦克筹办工作。初时我以为陈丽洲不是中共党员，怀疑他是国民党系统的，因而打算离开这里。过了二十多天，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中共广州市委派人告诉我，可以到那里工作，要求我们设法掌握好这支武装。于是我就留了下来，担任劳干队的副队长。

我在劳干队工作了约二月多。该队队员是从广州市各个工会（如印刷、公共汽车、黄包车、码头、理发、制药、旅业、茶居酒档、民船等工会）选送来的，共有130人，其中共产党员及思想进步的青年约40人，也有一部分是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会员。队中围绕领导权问题的斗争十分复杂，但基本上还是由共产党所控制。训练队内的中共党员分成两个支部：一个是由干部组成；另一个是由工人及职员组成。我参加了干部的党支部，担任党支部委员，分管军事训练及宣传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开会或备课，工作十分繁忙紧张。按正规军的要求训练，军事上要求达到新兵入伍的训练水平，游击时则可以作战。

1938年10月21日，全体队员正在早操，突然接到通知，到市公安局领取子弹(每人100发)及手榴弹等武器。这时日军已到东郊，广州市告急。郭大同带第一排走在前头，我带第三排作后卫掩护急行军，向北撤出广州市区。那时，广州市的警察大部分都走了，沿途公路两旁挤满了逃难的群众。在广花公路中段，我们遭到敌机轰炸，幸而我们及时做好掩蔽，没有受伤。入夜，我们转西官窑方向行军至芦苞，第二天早上到达清远城，补充了一点给养后转入清远白沙圩休整及寻找省委组织。后追踪至韶关，终于找到当时省委组织部的张月霞。

在韶关，劳干队有一百多人。中共党支部合并为一个。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劳干队的大部分中共党员撤出，留下少数党员如麦冠棠(工人)等坚持工作。当时张月霞同志与撤出来的30多名党员谈话，对他们进行思想工作。

1938年11月，根据省委的安排，我和郭群带领从劳干队撤出的30人到了南雄。在南雄城内的五华药房找到中共长江西局的黄文杰同志，由他介绍见到古大存同志。我们在南雄县府附近的一间大院住下。这时古大存同志化名为“黄坚成”，在国民党二十三游击区司令部挂名当上校参谋长，司令是莫雄将军。但古大存同志从未穿上军装，也从未见他到过南雄县府和司令部里办公。经古大存和莫雄商量，将刘登、郭大同等人安排到司令部参谋处，协助古大存志工作。

我亦挂职在参谋处，主要负责训练班的有关工作。我们以二十三游击队名义办了一个班，对外宣称是干部训练班，班主任是莫雄，但实际由古大存负责。全班学员30余人，班内组织一个秘密支部，编成三个小组，我既是班长又是支部书记。训练课程有：黄文杰同志讲党的“统一战线”，古大

存同志讲“游击战术”。这个班快要结束时，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赶来，在古大存家里向我们几个干部连夜传达了政治形势及党中央的新精神。事后，我们及时向全体党员作了传达。

莫雄对我们很信任，没有派人到训练班来。他在在训练班讲了两次话，在第一次讲话时，说他从小跟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长期以来坚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是军人，在广东革命军第四军任职，参加过北伐，以后又到宋子文那里任税警团团长，并派出精锐部队协同蔡延锴、张治中在上海与日军作战，他自己也上了前线等等。还讲了自己如何同中共合作的历史。第二次讲话，是关于第二十三游击区怎么办。他说如果日军要打通粤汉线，南雄是粤赣湘三省交界的重要地段，五岭一带会起重要作用。但没有讲广东二十三游击区的活动范围及将来如何。他讲话时，两名随从坐在门口，不让无关人员进去。

作为队长的我，经常要收集班里班外的情况向黄文杰及古大存汇报。古家靠近城外，我常去，古大存夫人曾史文很好客，训练班结束前，我写了训练班有关材料及学员名单给古大存。后来黄文杰有事离开南雄，学员的工作则由古大存和当地党的同志负责分配。这些同学有的加入新四军，有的去东江纵队，有的留在本地坚持斗争。我则仍回参谋处担任少校参谋。

莫雄知道我和郭大同都读过军校，刘登同志则是大学生，搞文化政治工作的。后来莫雄叫副官陪我们几个人去南雄北山一带走了一圈，那里有3个大队因我们向其领导人了解情况，来不及察看部队。据说离此不远还有一些部队，住在山里。但我们不知道部队有多少人及部队的具体地点。后来我们又到县的南部去了一趟，从而对全县有了初步的了

解。我们还翻过大庾岭，到赣州一带考察。

在训练班结束前后，大约是在11月，我陪同古大存接待过二次从南雄监狱及别的地方来的人员。据曾史文说，以前也接见过不少人，有的从江西来，他们当中有的是去参加红军的，古大存都送一些衣物给他们。

莫雄对我们很友善，对我们行动从不干预，我们非常自由。平时来往财政支出，也由副官代为报销。每月还由副官给我们几个挂职人员按官阶送来一笔薪金。

日本侵略者虽然来势汹汹，但兵力严重不足，无力打通粤汉线。由于战事趋缓，广东原设置的许多游击区也裁撤下来，二十三游击区是其中之一。莫雄则升任广东韶关行政专员韶关保安司令，离开南雄到了韶关。我们几个人也随古大存同志回到中共广东省委。我在韶关住了十多天，由于古大存同志的关系，还见过莫雄两次，莫雄仍对我们很热情，但从不问有关个人的事。以后，我和郭大同由省委调到东江纵队尹林平处工作，从此就再也没有和莫雄见过面了。在我的印象中，莫雄先生同中共合作是真诚的，他与古大存及其他工作人员有如亲密朋友。

解放后，据说莫雄还打听过我的情况，从报纸及其他渠道知道当年的李成、李守诚，就是西江的李镇靖，而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去拜访他。现他已逝世，谨写此文以作怀念。

1940年4月广东省委派我和郭大同等从韶关到河源，在县城与饶彰凤同志会面，然后去紫金县古竹镇乡间见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后来就和饶卫华、李健行（中共博罗县委书记）到博罗县城。当时博罗已有华侨回乡服务团在那里展开抗日救亡工作。我们在那里逗留约一个月时间，胡展光同志在黄田牌乡间，办了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到了后

期，胡展光回县任军事科长，由我去代理他的工作。不久又派我去响水。刘志远任组织部长、杨凡任区委书记、我任宣传部长及武装部部长，组成罗浮山南部区委会，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和肖伟诸等同志积极参与活动。其间又回县二区参加区长谭家驹、阮进（女）组织的学习班讲课。以后组织了七八十人的游击队（县政府命名为“随军杀敌队”），曾和日军及土匪打过一些仗。有一次为了封锁正果河下流的物资，以防流入敌区，我被当地农民及地方士绅送去国民党流亡在派潭山地区的县政府扣押几天。当时我党的地下党员、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总部秘书组少校参谋张道仁，带了十多名武装赶来，强迫增城县县长释放我，于是我就回队工作。那时正值国民党反共高潮，组织觉得要早作打算，我把队伍交给另一个同志，随后又到龙门县永汉一带搞了一些部队，我为队长，潘祖岳为指导员。我在增城龙博某地见到尹林平，他认为我在东江地区做群众组织工作不会说客家话，容易暴露，同意调我回西江工作。又说韶关党组织已被破坏，叫我绕道而行。当地党员王达宏给我筹集旅费，组织并派人送我绕路从化良口、汤塘回西江。

（二）

我是1940年7至8月间由龙门县永汉地区回到郁南的，由于交通险阻，党内关系很难转接，只好在桂圩乡间掩蔽下来，但不能呆等太久。新年过后我去拜见父亲李精益那里，正好拜见简师缺教师，我就担任国文、英语教员。父亲曾在国民党中央军第四军及十九路军任职，现是开建县后方总库长。不久，父亲报请我为三十五集团军兵站分监部的上尉参谋。一年后升为少

校参谋负担后勤粮站补给、军械、兵站、医院、交通线等计划部署。兵站最初设在广西梧州，后来东移到广东都城。我到了都城，中共西江特派员冯燊、张华为我接通党组织关系。我在都城有许多亲戚朋友，对开展工作十分有利。我首先在党内传达周恩来同志关于“在国民党内，统战区的组织，一律暂行停止活动，以不定期的党内联系，以应付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共高潮突然事变”的指示，要求党员同志对外“勤工、勤学、勤交友”，用民主人士面目出现，掩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势力的反动政策。我们两广地区，如桂林等地方受到很大破坏，而在罗定、云浮、郁南等地区，比较稳定，许多党员及民主人士，都到那里保存起来，并且有所发展。有一次，我和张华（西江特委）、唐章（三罗中心特委）、李殷丹等同志秘密集会，讨论形势。认为抗战正处于敌我相持阶段，错综复杂。郁南有十个党员，有基本群众，有一定社会基础，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依靠人民群众认真做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前就是要做好对李光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团结争取工作，利用好邓龙光的广东地方部队的力量，争取十九路军在三罗的地方势力，我们就会打开地方抗日战争的局面。全县如建城、桂坪、连城、罗沙、唉上、通门、大方和沿江的乡镇的二十多间小学以及县中学、都城简师等学校和县参议会，都建立了党的活动据点。我们与乡镇长、上中层士绅、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企业家都有来往。我们还有经济实业，如美行鞋厂、德兴昌制衣店、前进渡船等可以解决经费开支。全县有68个共产党员，他们与农民有着广泛的联系。在郁南的民主人士及家属，有李殷丹、张华、欧新、王炎光、招志刚、李见心、汪梅、江绥祚、李燮华、梁靄怡

等34人，他们都是抗日战争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1944年6月，中共西江特派员冯鼎同志来到都城、桂圩，恢复了党的组织及党支部活动。在张华、唐章、潘祖岳（他已由东江到西江），与桂圩镇长李茂欣组织了一支有120多人、两挺轻机枪、100多支步枪的抗日武装队伍。1944年9月，日本侵略军沿西江大举进犯，西江各地沦陷；敌军压境，国民党军队望风溃败。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邓龙光授意下级单位，如果兵站、粮库、枪弹库、医院、运输队伍等后勤站线，不能全部撤退时，就可以与地方合作，分散掩蔽起来。我得知这消息，就请李光汉出面，以郁南县民众抗日武力指挥部名义，向邓龙光借枪、借武器。我也参与和组织这次行动。这个部队成立后，就在郁南的井冲、青山庙、及建城东街等几个地方，伏击日军，打死打伤日军大尉、上尉官兵30余名，还打死日军战马等。后这个“南武”指挥部多次改组，以各种名义送走了国民党的一批官兵。任命我为部队参谋长，掌握其实权。这支队伍约三百多人，是可以完全指挥的，还有武装五百多人，如第一大队、特务中队、警卫排、突击队等等，共配有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九挺和步枪几百支，成为敌后地区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南武”也建立特别党支部，由中共西江特委直接领导，指挥部由我和周钊、黎曼青、吴耀枢、陈其荣组成。我们有直属十多个中队组织中共党支部，徐文华、徐国栋、陈美材、岑其韶等人以及郁南中共特派员潘祖岳、李茂欣、陈家志、唐伟、刘俊英、黄浩波等担任政治指导员。这支部队曾在日军驻地都城，打死其维持会会长徐石（石鬼仔）等人，并打击其特务龙强、谢国光、莫尚武，此后日军只去了一次桂圩，且日出夜归。沿江敌军不过一连，其任务是维护航线。我们曾出动重机枪占山头，拦

阻交通，这样使郁南县南江口以下的维持会组织搞不起来。郁南境内的土匪、流氓、“大天二”，都受我部所镇压，使郁南有一个正常的贸易、生产的社会秩序。

我们又用县参议会议长李光汉，及参议员卢鉴明等人出面，组成一个参议会乡镇长的治安委员会。派中共党员吴子熹、吴健担任秘书，掌管县的政权。国民党县长张中鼎早已逃到干官圩，挂起县府招牌，实际上县府已成为空壳。

我们又办了几期训练班，培养干部、发展党员、出版新郁南报纸、传单，广为宣传。

上级有意图，拟和李济深、蔡廷锴两将军组织华南抗日民主部队，在西南地区逐步开展抗日民主运动。

李济深将军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北伐战争的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为孙中山先生的信仰者，他积极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曾被蒋介石囚禁于汤山，1933年担任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主席，公开反对蒋介石。1937年初与蒋介石合作进行抗日战争，1940年调任国民党桂林办公厅主任。在湘桂战争前夕，蒋介石调李济深任重庆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蒋用意十分明显，是要削弱李济深的力量。李济深、蔡廷锴两将军接受我党周恩来同志意见，携同其身边人员及电台密码，由桂林回到广东、广西敌后，坚持抗战。并在适当时机与中共合作，举起抗战旗帜，发动人民组织起来，成立抗日武装。在桂林时，他们通过张发奎，任命张炎回广东南路酝酿起义，但时机过早，张炎失败后被捕。李济深刚回广西苍梧大坡山，就不辞疲劳地赶去营救，但营救无效，张炎在玉林被蒋介石秘密枪决。李济深便返回罗定与蔡廷锴商量对策。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李嘉人去罗定对李、蔡表示支持。我遵照中共“三罗”党组织意见，会同县

参议长李光汉先生（李济深的旧部）委罗定见李济深、蔡廷锴两将军。李济深取道郁南回家经过通门时，向当地群众宣传、发动抗日。他在群众欢迎大会上，纵谈局势和他的政治主张。他说：“你们不要对政府有幻想，要靠自己武装进行自卫”。他又说：“南京汪精卫和重庆蒋介石都说我李某（即李济深）回乡有阴谋，但我没有阴谋，只有阳谋。阳谋就是发动群众，武装起来，抗日救国。讨伐汪精卫，反对妥协投降！”李济深将军的长篇讲话，经他审阅同意，大量印刷，到处散发，广泛宣传。在欢迎大会主席台上，张挂一副对联：“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这副对联，是我借元代赵孟頫诗句欢迎他的。无疑是给他传递一个讯息，告诉他，我们这个队伍，是有政治远见的，可靠的，忠心拥护他的。以后，我多次送他回老家大坡山，接受他的指导。我们也派出一个精干部队，在他邻近的的广东郁南平台圩附近，给他以呼应，实际是警卫。

李、蔡将军及狄超白、胡希明等，在广东罗定及广西苍梧大坡山密商组织“中国西南抗日民主联军”问题，得到桂东一批民主人士支持，也得到重庆的中共地下党、广东东江纵队、粤中游击队、三罗（郁南）地区人民的支持。我党在华中的队伍亦有行动，如王震、王首道成立的“南下支队”。但李济深、蔡廷锴将军的目的没有实现。而且，一开始，广东的南路张炎将军的起义失败了，给人们蒙上阴影。也由于本身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所以没有实际行动。而且，形势急速变化，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拟定南下两个梯队即转头北上，所以，李、蔡所希望的抗日民主联军没有组织起来。

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带保卫小队到苍梧大坡山料神拜访